

康熙幾暇格物編的法文節譯本

陳 受 頤

(一) 十八世紀關於中國的三部法文鉅著

十八世紀是近代中西文化溝通初期的由極盛而轉入衰落的時代，又是由歐洲好幾國的教士共同參加而變為法國教士逐漸包辦的時代。當時蟬聯而出的三種大規模的有關中國的歐洲刊物，都是用法文寫定印行然後轉譯為他種歐洲文字的。第一種是一七三五年在巴黎出版的杜赫德主編的四大厚冊對開本的中國通志（註一）。第二種是期刊性的耶穌會士通信集，一七〇二年巴黎耶穌會的總書記雷果辦創辦主編，其後繼續出版，到一七七六年停刊的時候，一共出了三十四冊。此書所刊佈的教士通訊，雖然包涵着關於南北美洲和印度近東的報導，主要的材料却毫無問題地是入華教士寄發的那一部份（註二）。第三種是一七七六至一八一四年間陸續刊行的中國叢刊，一共出了厚厚的十六冊（註三）。當時有關中國的著述雖然很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十三厚冊的

（註一）編者的姓名原文是 Jean Baptiste Du Halde 方杰人（蒙）教授譯為杜赫德（中西交通史第五冊一八五頁），今從之。王國維舊譯為特赫爾特（王忠愍公遺書丁卯排印本四集宋元戲曲考八一頁）。戲曲考又云：「至我國戲曲之譯為外國文字也，為時頗早。如趙氏孤兒，則法人特赫爾特實譯於千七百六十二年；至一千八百三十四年而裴利安又重譯之。」這句話不全對。趙氏孤兒的譯者是馬約瑟 Joseph-Henry-Marie de Prémare 神甫，譯文在中國通志的第三冊三三九至三七八頁，一七三五年刊行。中國通志的原文名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Tartarie Chinoise。

（註二）第一集刊行於一七〇二年，到一七〇三年改稱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 Etrangères par quelques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esus。編輯人是（一）一七〇二至一七〇八出版的前集和一至八集——Charles Le Gobien (1653-1708)；（二）一七一一至一七四三出版的第九集至第二十四集——Jean Baptiste Du Halde (1694-1743)；（三）一七四九至一七七六出版的第二十五集至最末了的第三十四集——Louis Patouillet (1699-1779)。三位都是耶穌會士，都沒有到過中國。第三位——帕都葉神甫——是服爾德在文章裏常常談諷的。

（註三）原文的標題是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oeurs, les usages, ec.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e-kin 就是說「北京教士所寫的關於中國人的歷史、科學、藝術和風俗習慣的叢刊」。書背簡稱 Mémoires des Chinois 故翻為「中國叢刊」。

馮秉正的法譯通鑑綱目和他自著的續編(註一)——但是流通之廣，影響之大，都不能和這三部書相提並論，無怪日本的後藤末雄教授稱之為歐洲十八世紀有關中國的三大名著了(註二)。

這「三大名著」不特編輯的體例各自不同，就是材料的性質，也並不一致。中國通志是杜赫德神父根據積聚了一百多年的入華耶穌會士的各種著述和通訊，經過相當長期的消化，小心的選擇，系統的編排，一手鑄成的綜合式的著述。耶穌會士通訊集可以說是「原史料」的期刊，雖然有主編的人，並不見有很多「刪訂」的痕迹。牠的缺點是內容龐雜，關於佈教的記載，又有許多侈陳靈異的地方；牠的長處是未經洗鍊，書簡的原來面目差不多全部保存，有時瑣屑囉嗦的地方，特別有趣。關於中國的部份，尤其受當時讀者的歡迎，因為裏面有不斷的新鮮而生活的材料。

可是，在通訊集刊行的七十四年之間——由一七〇二至一七七六年——新舊世界都已經過了不少的重要的轉變了，我們在此不必細說。就是整個耶穌會的地位，尤其是會士在中國一方的地位和他們的溝通中西文化的工作和影響，也早已受到了極大的動搖了。西歐的幾個天主教國家，相率運用政治的壓力，在短短的十一年裏竟把一個國際性的龐大的組織完全消滅了。首先在一七六二年巴黎議會通過了一個抨擊耶穌會的議案，說他們「淪衣冠於禽獸，變教友為邪徒」(註三)。一七六七年西班牙下令驅逐耶穌會士。兩年之後，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那波里四國更聯合要教廷解散該會。一七七三年教宗克肋孟十四，便愛莫能助的接受四國要求，下解散耶穌會的明令了。

在此情形之下，耶穌會士通訊集是無法繼續刊行的了，最後出版的四集——都在一七七三年之後——只能看作結束刊物的尾聲。然而會的組織雖被解散，傳教事業雖然委託了其他的宗教機關接收，可是入華的耶穌會士，仍然繼續在中國居留。更重

(註一) 馮秉正 Joseph-Ann-Marie de Moyriac de Mailla 的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ou Annales de cet Empire*; traduites du Tong-Kien-Kang-Mou 寫定於一七三七年，刊行於一七七七至一七八五年，共十三厚冊。

(註二) 支那思想のフランス西漸(東京第一書房昭和八年版)頁一九五。

(註三) 見 Georges Soulié de Morant 著的 *l'Épopée des Jésuites française en Chine* (Paris, 1927) 頁二二三以下引。議案的序言譏耶穌會士為無惡不作。本文意譯的句子是“ils enseignent aux hommes à vivre comme des bêtes, et aux chrétiens, à vivre en païens。”

要的是，他們的中國研究的工作，仍然受西方智識界的注意。改裝易服地繼承着會士通訊集的工作的便是中國叢刊。叢刊的初集跟通訊集的最後一冊，同在一七七六年出版，單從這一點看來，已經可以透露兩種刊物薪火相傳的消息了。

然而從另一角度看來，我們又不能不說叢刊到底是「另起爐灶」的新刊物。(一)耶穌會的解散是波及西歐思想界的傳教史裏的一件劃時代的重大事情，主要的導火線恰巧又是所謂「中國典禮」問題的長期的爭辯。爲了忌諱的緣故，「耶穌會」，「耶穌會士」，「中國典禮」，這些字眼，都不大重提了。叢刊扉頁說到材料的來源，也只好隱約其辭的說「北京教士」。發刊詞裏所特筆大書的兩個留法十五六年的中國學生高類思和楊德望，原是北京耶穌會士保送，後來在巴黎又躬親入會的經過，也只好曲筆拖過，諱莫如深了。(二)中國叢刊每期登載學術性的專著或翻譯文章三五種或多至十種八種，體材和內容，都與通訊集異趣(註一)。而且先後主編的三個人，都是以學者的資格受政府的資助與委託的：勃羅提業雖曾當過耶穌會士，他的專業是希伯萊，希臘和羅馬古代錢幣的研究；老德經是法國王家學院的敘利亞文教授，曾著匈奴族突厥族與蒙古通史；薩西精通十幾種歐洲和近東的古今語言，尤長於波斯和亞拉伯學，是近代比較文法學的先導者之一，又是後來(一八二二)法國亞洲學會的發起人之一(註二)。

叢刊的成立，可以說是法國初期系統「漢學」的先驅了。

(二) 中國叢刊在十八世紀歐洲的地位

上面寫的冗長引論，殊有頭重體輕之感，可是中國叢刊的歷史地位和刊印的經過，似乎還未受過國人相當的注意。例如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中法漢學研究所在北平鄭重舉行之「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之法國漢學」圖書展覽會中，編號第十二項即爲此刊。展覽會書目著錄的出版年月爲一七七六至一八一四年，與我們前段所說的原刊本完全符合；可是同書目(頁十四)所影印的叢刊第一期的標題頁，却明明白白的說是「共和

(註一) 日本石田幹之助教授著的歐人の支那研究頁二一三——二一八有每期目錄的詳細譯文，可參看。法國高狄爾 (Henri Cordier) 的中國書志 (Bibliotheca Sinica) 五四——五五欄有原文的細目。第十一期包含文章篇數二十多篇，可以說是例外。

(註二) 三人姓名的原文是 Gabriel Brotier, 1723-89; Joseph de Guignes, 1721-1810; Antoine Isaac Sylvestre de Sacy, 1758-1838。老德經者，所以別於他的兒子小德經 Chrétien Louis Joseph de Guignes 也。

五年」——即公元一七九七，證明這是很罕見的巴黎重印本，連最爲精心結集的高狄爾的中國書錄的正編補遺和續編都沒有著錄過的，而展覽書目的說明部份，竟然沒有按語。無怪「緒言」中全不提到叢刊的特性，和他在歐洲知識發達史上的地位了（註一）。

發軔於還未統一的德國而大成於法國的所謂「啓明運動」，包涵十八世紀歐洲學術史的兩種共同趨勢：範圍的擴張與比較的方法。用一句話總括起來，便是新材料的尋求與運用。所以中國叢刊，比起其他的有關中國的刊物，可以說是更爲適應時代的要求的。

叢刊的搜集材料的工作，雖然靠着居留中國的已被解散的耶穌會士，大體說來，已不是佈教工作的產物而是學術性的論著了。

叢刊除了學術論著之外，常常還有譯文。例如第一期有大學和中庸的法文新譯本，第二期有司馬光的一首園庭詩（註二），第四期有康熙幾暇格物編。第四期以下，專著漸多，翻譯漸少，然而第十三期裏面，還有幾首中國詩的譯文。這些翻譯的文章，雖然都排近卷末，可不是隨便搜集來填塞篇幅的。大學和中庸，誠然是自從利瑪竇到中國之後，便經過不知多少回的歐譯的了（註三）。這回重譯的原因——暫且不提譯筆的好壞——大抵是因爲幾本拉丁文的舊譯既不通俗，他們的轉手法譯本又多了一層間隔，而且都是早期刊出，免不了與所謂典禮問題的教爭，有多少的關係，倒不如重新直譯，可以省去了種種的誤會與麻煩（註四）。園庭詩的翻譯，是因爲當時所謂中國式的花園，早已成爲時尚，這種材料，最受讀者的歡迎。詩的翻譯，也響應了在萌芽的文學上的浪漫主義的趨勢——搜求邃古和遠方的韻文的熱鬧。幾暇格物編的翻譯，正如叢刊裏的好些偏向科學的文章，正合當時「百科全書」運動的格致派的口味，更不待言了。

（註一）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之法國漢學頁十四、十五。我從前疑心「共和五年」本是原刊本的化身，只換了新的標題頁，後來才覺得證據不足，至今還未敢斷定。

（註二）我曾翻看四部叢刊新印宋紹興本溫國文正司馬公集兩回，都沒有找出所謂園庭詩的原文，誌此待考。

（註三）利瑪竇曾翻譯四書，現在雖然未曾找到手稿，可是在他的全集的已刊的部份，到處可找證據。參看中國書誌第三七九欄。

（註四）中國書誌一三八六——一四〇三欄，又三七九四——三七九六欄。支那思想のフランス西漸頁二一九——二二六有三種譯文的比較。

(三) 幾暇格物編的譯者——韓國英神甫的著者的因緣

康熙幾暇格物編的譯者是法國教士 Pierre-Martial Cibet 神甫。他的中國姓名是韓國英，字伯督。公元一七二七年生於法國中部的里摩日 Limoges 城，一七八〇年卒於北京。十六歲入耶穌會，專治人文科學，以勤學著稱。畢業後請求該會派遣到中國去。一七五九年到中國，一七六〇年(乾隆二十五年)移居北京。他在中國繼續居住的二十一年零兩個月，差不多全部在北京度過(註一)。

韓國英的基本訓練，雖然是人文科學，他對於當時的所謂格致之學也是有相當的修養的。據他自己的通信所記載，他曾花了四五年的工夫供奉內廷，做佈置水景，修理鐘表和其他的法條機器的零碎工作。甚至「中國的凡爾賽」的栽花種樹，他也參加。他對於植物學的興趣和知識，後來給他不少的著述的資料。

說到著述的分量，他的地位在同輩的會士中，是特出的，只有錢德明(字若瑟，一七一八——一七九三)一人比他優越(註二)。中國叢刊的文章，多由他們兩人執筆，不是偶然的。錢德明在叢刊的最初三期裏面，除了翻譯大學，中庸，和司馬光的園庭詩之外，還做了九篇文章，大多數是關於植物的長篇割記，最長的一篇是論中國的遷古。到了第四期，則竟然整本都是他的譯著了！

康熙幾暇格物編的譯文，就是在第四期(一七七九年)發表的。

韓國英爲甚麼要挑選幾暇格物編來翻譯呢？除了上面說過的適應當時法國——甚至歐洲——的知識口味之外，大抵還有旁的理由。清聖祖是初期耶穌會士所最佩服最稱譽的中國君主。從宗教上看來，他是耶穌會士的庇護人，不特平反了由楊光先事件而受處分的教士教徒的冤獄，而且拔用南懷仁以次的教士於欽天監。後來「典禮問題」變爲天主教的內鬩時，他又始終支持耶穌會士閔明我、徐日昇、安多、張誠等對於祭

(註一) 費類之神甫著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e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a* (上海一九三四年刊)卷二頁八九〇至九〇二。此書共收會士傳記五百六十七篇，卷一的最初的五十篇，有馮承鈞譯本，改題入華耶穌會士列傳(民國二十七年商務印書館刊行)。韓國英的傳，是四百一十篇，故未譯出。

(註二) 錢德明神甫的法文名字是 Jean-Joseph-Marie Amiot，他的傳記和著述表見入華耶穌會士列傳原文本第二冊頁八三七至八六〇。

天祀孔與祀祖的看法(註一)。至於正教奉褒所記載的「康熙十年冬，御書敬天二字匾額賜懸堂中，並諭曰：朕書敬天，即敬天主也。」的一件事，更足以引起聖祖可成「中國的君士坦丁」的希望與祈求了(註二)。韓國英雖然生得較晚，然而同會的修士們都誇說他的篤信和佈教的虔誠，那麼他對於護教的「康熙大帝」，有無限的低回嚮往之情，也是意料中之事吧。

從政治上之修明來說，耶穌會士心目中的清聖祖，也是值得誇張的。和他同時代的歐洲君主，正是法國的路易十四，是派遣法籍耶穌會士到中國去特別作科學研究的主動人。所以當時耶穌會士著文介紹清聖祖的人，常常把兩位東西方的君主相提並論，歎為盛事，文繁不具引。姑且舉一個最顯著的例子。法國的白晉神甫，曾於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著康熙帝傳，獻書於路易十四。在獻書詞的第一段裏面，著者就明明白白地說：「清主厚幸，其儼同陛下者，不止一端，其在教外區域之超羣軼倫，猶陛下之於奉教諸邦也。」(註三)。然而路易十四於一七一五年崩逝之後，他的霸業便及身而絕，法國的官府都瀕於破產之危，其後政治又一步步的增加紊亂。在東西兩君主的對照中，相形見絀了，怪不得法國革命前政論家所稱許的所謂開明專制君主的模範，不是路易而是康熙。

從學問上的虛心和成就來說，會士之於聖祖，也是最為佩服的，雖然他們的宣傳，有時不免於過份的渲染(註四)。例如聖祖常寫別字，如我們在康熙與羅馬關係文書與其他的硃批奏摺所看見的，而教士們乃衆口同聲地說他文學造詣之高。又如他誠然是留心天算，恐怕也不見得絕頂聰明，如教士們之所報導。掌故叢編曾載不見於實錄聖訓東華錄的有關聖祖學習天算的諭旨兩條，錄之以見此中消息：

杜德美曾進過算日出入昏刻不同之表，朕比〔彼〕時且叫那〔拿〕回去。今有用

(註一) 黃伯祿正教奉褒(光緒三十年上海慈母堂排印行)卷二，頁一二二至一二三。其實正教奉褒全書的大部份，都是康熙朝庇護教士的文獻。閔明我的原名是 Philippe-Marie Grimaldi (1675-1712)；徐日昇是 Thomas Pereira (1672-1708)；安多是 Antoine Thomas (1685-1709)；張誠是 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87-1707)。此註括符裏的年份是每人的入華年和逝世年，不是生卒年。

(註二) 正教奉褒卷上，頁七十一下。

(註三) Joachim Bouvet 神甫著 Histoire de l'Empereur de Chine, Paris, 1699 頁六。

(註四) 白晉在康熙帝傳的跋文，要鄭重的說明是「語無增飾」，其實是渲染過甚，尤其是記聖祖學算的一段，頁一〇三以下。

處，杜德美將進過的表察明遇着速報上帶來。(註一)

諭王化道：朕自起身以來，每日同阿哥等察阿爾巴拉〔代數，即 Algebra 的對音〕。新法最難明白，他說比舊法易，看來比舊法愈難。錯處亦甚多，鶻突處也不少。前者朕偶爾傳於北京西洋人開數表之根，寫的極明白。爾將此上諭抄出，並此書發到京裏去，着西洋人共同細察，將不通的文章一概刪去。還有言者：甲乘甲，乙乘乙，總無數目，即乘出來亦不知多少。看起來，想此人算法平平爾，「太少」二字，即可笑也。特諭。(註二)

據我們可以考定的，聖祖曾學算於三個耶穌會士：南懷仁，張誠，和白晉(註三)。南懷仁死於一六八八年，那時聖祖還不會同阿哥們一齊學算。那麼「算法平平」的，不是張誠就是白晉了，兩位却都是法國王家科學院的院士，都以算學見長！然而聖祖的自負不凡的性格，到底是逃過了西洋人的觀察了。所以韓國英在幾暇格物編譯本的序文上說：

康熙帝是中國從古以來的最偉大的君主中的一個。他是文士、學者、思想家、大政治家、公民、人們的朋友、武士，集高度的多能衆善於一身……詩文、歷史、法理、考古都是他之所長。西洋的天文學輸入中國時，他又從一個教士受業……中國的皇帝們都有很多的臣僚代司筆札，無疑地康熙帝也利用他們來草擬諭旨法令，和代作皇帝以庶士元首的資格必須簽名的官樣文章。可是詩歌論說，與夫有關道德性理的文章，和帶着他的天才標識的察物考證的作品，便完全不同，讀者一看便感到是他的手筆了。我們現在所付給讀者們的觀察記錄，便是屬於這一類的。(註四)

(註一) 掌故叢編第二輯(故宮博物院民國十七年刊)聖祖諭旨二，頁十六下。杜德美原名 Pierre Jartoux，一七〇一入華，一七二〇逝世。

(註二) 同上，頁十五下。聖祖諭旨二有兩條見於幾暇格物編：(一)「地球」條，和(二)「潮汐」條。諭旨二的原文，都是聖祖手寫的，故有別字，如「錢塘」作「前堂」。由此可以推想幾暇格物編是集合無數零張碎幅結合而成的。

(註三) 南懷仁是 Ferdinand Verbiest，一六五九入華，一六八八逝世。張誠見前頁註一，白晉見前頁註二、註三。

(註四) 中國叢刊原本，第四期，頁四五三。後藤末雄中西文化の流通(昭和十三年東京第一書房刊)第三章述康熙帝與西洋文化，可參看。

(四) 幾暇格物編的本子

康熙幾暇格物編是清聖祖的零碎筆記的結集，總共九十三條，體裁與一般的筆記相同，不必細述。他的內容，大體說來，也沒有甚麼特殊之處。不過他在位六十多年，接近的臣僚，自然有不少中外博聞之士；而且他到的地方也相當的多，在關內外的巡幸親征，給他不少增加見聞的機會。此外，他對於西洋科學，尤其是天算音樂醫藥，造詣雖然並不見得精深，也曾給予過長期的注意，故此他積集多年的筆記，也未嘗沒有一點自己的作風。如第三條「方音」云：

朕巡歷七省，土俗民風皆留心體察。凡各省分界處，其土人語音即異。如直隸各府所屬，聲口間有不同，而亦不甚相遠。若一入德州界，便是山東語音，一入固關界，便是山西語音。以至江浙，無不如此，蓋隸分各省故也。蒙古部落雖多，其語言總無大異，以咸在郭畢也（原注郭畢即瀚海，其地多砂石少草木）。至其地者一見而知其為郭畢，猶至窩集者一見而知其為窩集也（原注窩集者密樹叢林，冬夏不見天日）。——法譯本卅七條

這雖然是十分幼稚的方音論，但比紙上談音的猜度，也許稍勝一籌。又如第九條「穀穗變蚊」，雖然荒誕，記載得也若有其事：

策妄阿喇布坦地方多種水田，頗無旱潦之患，惟或一年穀穗變蚊而飛，撚視之為水或為血。朕曾遣侍衛到彼親見其事。嘗閱嶺南異物志云：「嶺表有樹，結實如枇杷。每熟即拆裂，蚊子羣飛，土人謂之蚊子樹」。此與穀穗變蚊之事相類。程子曰：「天下之物必有對」，即此可見矣。——法譯本廿五條

這類的記載，在十八世紀的前期，是毫不足怪的，在西歐也是如此。

最低限度，由教士看來，這類的文章，總比起聖祖的詩文，有用得多，有趣得多，而又容易介紹得多了。故此韓國英故意鄭重的說：

此編全書卷數繁多，我們在這裏所提供的，只是第四集的一部份。全書是共有一百多冊的。

這話有兩點很值得注意：（一）韓國英所說的「全書」，大概是一百七十六卷的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二）譯者所用的幾暇格物編的本子，是附載於聖祖文集裏的。據提

要說(四庫總目提要卷一百七十三集部二十六別集類二十六)該集「前後共分四集，以次成編。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以前爲初集……四十卷。自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以前爲二集……五十卷。自康熙五十年辛卯以前爲三集……五十卷。至五十一年壬辰以後，六十年壬寅以前……世宗憲皇帝嗣踐皇圖，始命和碩莊親王允祿編爲四集三十六卷，通一百七十六卷，合爲一編。……」幾暇格物編在光緒以前，似乎沒有單行本見于著錄，而「地震」一條又有「朕臨攬六十年，讀書閱事，務體驗至理」的話，則韓國英所見的本子，必是聖祖文集第四集的本子，差不多是可以斷定的了。

原刊本(就是聖祖文集本)的幾暇格物編手頭無書，我所根據的只是盛昱的手寫石印單行本。此本分爲上下二編，每編又分爲上中下，實爲六卷。此本寫於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似是最早的單行本(註一)。楊鍾義——盛昱的表弟——的意園事略說：

……[光緒]十五年八月初四日，因病奏請開缺，家居劇門，日惟考訂古籍，益陳三代彝器法書名畫以自虞樂，手寫康熙幾暇格物編付石印。……」(註二)

寫本的字體雖然不是正楷，也是極其工整的近於楷體的行書，可說是精鈔本。鈔本雖無序跋，假如我的記憶是可靠的話，是一字不改的由聖祖文集過錄的；無論如何，鈔本的最末一行「朝議大夫前國子監祭酒臣宗室盛昱敬錄」的幾個字，總可保證沒有刪削或竄亂原文的大不敬了。

(五)

上段的一大堆話，是要指出法文譯本的特性的，指出他不是規規矩矩的翻譯。從來泛稱韓國英的法文本爲「譯本」的話，須要稍加修正。

第一：法文本不是全譯而是節譯。幾暇格物編的原本共有長短不一致的筆記九十三條，韓國英只譯了四十二條，還不到原書的一半。去取的標準，有時可以猜想出

(註一) 此外又見收於高安鄒凌沉編輯的通學齋叢書，和鴻寶齋印行的維新學叢書。通學齋叢書內有天演論，而天演論的嚴復自序作于一八九六年光緒丙申，吳汝綸的序作于一八九八光緒戊戌，故通學齋叢書的編成不能早於一八九八。維新學叢書向來未見著錄，此據河內遠東學院叢刊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卷三(一九〇三)頁七四七的預告。維新學叢書如果刊成，也在一九〇三年之後。

(註二) 繆荃孫續碑傳集卷七十頁二十五下。

來；有關狹義性的中國詩文史地，歐洲人不易看得懂的不翻（第十「土伯特」，十三「察哈延山」，十八「山海關」，四六「詩文以命意爲工」，四九「文章體道親切惟有朱子」，五五「回子多元子孫」，六五「趙孟頫命名」，八六「江源」）；有教士們以爲異端的不翻（一四「南無字義」，二九「理氣」，七一「人依土生」，七三「兩尺脈屬兩腎」——談五行，八三「人中」）；表面看來無關中國的也不翻（六十「朝鮮紙」，八七「恒河」）。

第二：法文本各條排列的次序，完全改換了原本的面目，同時又並沒有顯出故意分類重排的痕跡。本來筆記式的著述，大多數是隨意排比，譯者也必定體會這種特點，所以跟着他自己的興趣，隨意選譯，也未可知。

第三：最奇怪的是譯本裏有五條，是原文沒有的：六「漆」，十五「嬰兒」，二三「氣候」，三三「營養品」，四十「飲水」。五條都是饒有趣味的，而且都有聖祖的自傳口氣的按語，說到他自己的經驗。這五條何以不見於盛昱寫本的原文，來源究竟在那裏，待考。

第四：譯文雖然大都能够傳達原書的大意，却不是句斟字酌的矜慎的翻譯。我把譯本與原著細心比較之後，覺得譯文有很多草率和誤譯的地方。我們雖然大可不必花費時間去替這部小書尋求「譯例」，有幾點是值得說明的：

（甲）譯者故意改動原文，以求讀者容易了解。例如七十九條「金光子」（法譯本三七條）說「金光子……四月開花」，譯本改爲「五月」，是改陰曆爲陽曆。六八條「風隨地殊」（法譯本二八條上半）說「諺云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雨」，譯本改爲「百略不同風，十略不同雨。」略（lieues）是法國度長的單位，等於四公里，譯文計算雖不準確，比之泛言「華里」，也許容易了解一些。

（乙）中國的書名人名，稍爲偏僻一點的都被刪掉。例如第五條「鳥鼠同穴」（法譯本二四條）說：「如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孔安國云『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蔡沈謂其說怪誕不經，此特蔡沈未至其地耳。張鵬翮奉命往俄羅斯，經過地方，見鳥鼠同穴事。朕曾面詢之，知禹貢之言不誣。」譯本不特保存禹貢的名字，而且說是「書經中的禹貢」。「孔安國」譯爲「有名的註釋者」，蔡沈的名字完全省去，「張鵬翮」改爲「朕遣赴莫斯科之使臣」。

(丙)大部份的節省和誤譯或死譯，皆由譯者的漢文修養有限，而又急於成書的原故。例如上舉禹貢的「導渭自鳥鼠同穴」譯者誤「渭自」爲水名，「導」字失翻，便寫作 *La rive du Ouei-tsei!* 又如五四條「同聲相應」(法譯本十二條)，是談樂理論審音的，譯文中的弱點最多，瞎猜死譯，隨在而是。「至若清池之方，響應薤賓而躍；光宅之塔，鈴應姑洗而鳴」，則譯者完全無法應付了。再如四七條「落葉松」(法譯本第三條)說「五臺及口外與安高寒之地，有樹名落葉松。」譯文竟把「安高寒」合爲一詞 (*Ngan-kao-han*)，誤作地名，則顯然是辨字不清，點句不斷，誤讀原文爲「五臺及口外與安高寒之地」了。

無怪比他後一代的前期法國漢學者雷慕薩 (*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說韓國英神甫「不能駕馭他的幻想，因此不能避免若干的訛誤」了(註一)。不過胡適之先生曾說過，中國舊書的沒有標點，的確是會給予外國學人許多不可避免的困難的，就是當代以漢學名家的西洋朋友當中，也有不少因爲沒有弄清句讀，而翻譯和解釋錯誤的例子。當代的專家尚且如是，我們對於這位不斷的努力而心靈上又因禁教的原故時時感受苦痛的耶穌會士中的學人，似乎是不應該過於苛求的。

康熙幾暇格物編的法文節譯本——尤其是關於植物的部份——是有相當的貢獻的。整個世紀之後，當勃烈士乃德爾 (*Emil Vasilievitch Bretschneider*) 寫定他的中國植物誌 (*Botanicon Sinicum*) 的時候(一八八一年)，還提到這書的原文和節譯本(註二)。至於譯者韓國英神甫除了節譯此書及大學中庸之外，又曾爲長文多篇解說中國的孝道和語文，介紹洗冤錄和中國道教的修鍊工夫。縱使他的成績比不上他的前輩，也總算是乾隆末葉溝通中西文化的一位功臣了。

(註一) 入華耶穌會士列傳法文本，頁八九〇。

(註二) 英國王家亞洲學會華北支會會刊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新編卷十六(一八八一)頁一八五。